

编者按

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,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,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,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。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,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,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,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,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,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,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

本报围绕这一主题,邀请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李治安撰文,从中国古代思想更新演进的角度,阐释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趋势。

百家争鸣

春秋战国,因剧烈的社会变革而“礼崩乐坏”,“学在官府”的旧秩序被打破,应运而生的是私学和士人。二者的结合,直接孕育了诸子学各流派,并在相互争论诤难中呈现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兴盛繁荣,史称“百家争鸣”。

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,“游文于六经之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”,崇尚礼乐,以仁义为基本范畴,关注人性与教化。儒家偏重“助人君顺阴阳名教化”“列君臣父子之礼,序夫妇长幼之别”,虽然在当时政坛上难以推行,但在塑造传统社会政治、伦理和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,对后世影响最大。

道家创始人老子最早提出道为万物本原,崇尚“道法自然”。庄子更是鼓吹“是非之彰也,道之以亏也”,追求虚无自在与认识的相对主义。道家一直和儒家并称,所包含的哲理智慧最为丰富深邃,对哲学及宗教发展影响重大。

墨家学派鼓吹“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”的高贤说,主张节用及非乐、节葬,推崇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。墨家注重下层现实,曾经是与儒家对垒的显学。

法家代表人物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和韩非,推崇法、术、势,倡导“耕战”和君主专制,主张以君主、国家为中心和尊君卑臣,在列国争霸和兼并过程中大行其道,对建构秦以降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名家主要分析讨论形名逻辑关系。惠施注重“合同异”,公孙龙强调“离坚白”,其“白马非马”说,颇有影响力。

阴阳家试图用阴阳和五行理论去解释世界,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去探寻“五德转移,治各有宜”,曾长期影响着古人的思维方式。



争鸣 交融 合汇

古代思想文化的不断更新演进

李治安
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,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,其突出表现是守正不守旧、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大无畏品格。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,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趋势相似,主要历经百家争鸣、三教交汇、理学复兴等三次发展高潮,后浪推前浪,不断更新演进。

自战国初,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成为诸子百家荟萃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,而且其兼容并包,不主一家。法家慎到、阴阳家鼻祖邹衍、黄老道家田骈、老子弟子环渊、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孟轲等,皆在稷下讲学。诸子百家的争鸣和交流,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,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,在很多方面甚至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巅峰。遗憾的是,此局面因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和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一去不复返。

三教交汇

所谓三教交汇,是指儒学、道教和佛教在对立冲突中走向交融、汇合。它是传统文化因佛教东来而首次发生的较强反响和在变动,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独尊的局面,故可称“百家争鸣”之后的第二次思想文化高潮。

西汉末,印度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原。由于佛图澄、道安等布道和译经,佛教传播较快。汉明帝时楚王刘英“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”,后赵季龙以“佛是戎神”,虔诚奉信,竭力佑护。北魏文帝称帝:“浮屠‘助王政之禁律,益仁智之善性’。佛教趋于鼎盛,胡、汉百姓出家日增,连梁武帝也弃道皈依佛门。

佛教传入后引起道教、儒士的较多批评。东汉中期,民间巫术融汇黄老,推尊老聃,以《太平经》为经典,形成了道教。西晋王浮作《老子化胡经》贬损佛教。东晋蔡谟指责“佛者,夷狄之俗”。宋末顾欢宣传夷夏之别,崇道黜佛。梁范缜激烈抨击佛教的神不灭论。唐太宗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前。武周又规定佛教居首位。道士傅奕曾上奏除去佛教。韩愈冒死直谏唐宪宗“事佛”而被贬谪。三教的争执冲突,主要集中在“礼敬王者”和“夷夏之争”。儒、道还推助了北魏太武帝、北

周武帝、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“三武一宗”的灭佛举措。

虽经历史上交锋冲突,时至唐宋,儒、佛、道又在争辩中彼此影响,互相吸收,逐渐趋于三教的通融汇合。

佛教充分肯定儒学的纲常伦理,用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去解释“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饮酒、不妄语”,宣扬“有助王化”。佛教还形成各有教义的本土化宗派,如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、禅宗和密宗等。各宗派大多吸收儒、道精神,概以人人都有佛性,顿悟即可成佛为特征,打破夷夏藩篱,完成了适宜民众接受的佛教中国化。

为和佛教抗衡,道教和儒学不得不吸收佛教的营养。道教不时采纳佛教元素,创建自身理论体系及教规,尤其是金元全真道标榜“三教合一”“兼而修之”,实现以内丹术为主的信仰革新。儒学也吸收佛、道精华,完成向理学的转型。不少儒士出入儒、释、道,成为三教通融的先驱。即使抨击佛教的韩愈,其道统说和复信论也曾吸收佛教的法统及心性学说。

确切地说,“三教交汇”就是儒、佛、道和而不同,和谐共存,各有擅长,“相资为美”,以各自文化功能实现所谓“以佛治心,以道治身,以儒治世”,从不同层面汇合成唐宋以降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。

理学复兴

孔孟儒学大半停留在伦常道德的总结,两汉儒学杂入阴阳家等,鼓吹“天人合一”和“究天人之际”,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,基本囿于“天地父子生成图式”。儒学哲理提升的历程,大抵是在佛、道的刺激下实施的。魏晋玄学最早以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易经》三玄改造儒学,解经求义,算是儒学哲理提升的先声。然而,

最终完成复兴儒学及其哲理提升,无疑将仰赖宋明理学。换言之,今日人们看到的儒学,并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,而是扬弃汉唐经学之后的程朱新儒学,亦可称理学复兴。

周熹撰《太极图说》,吸收佛、道的宇宙生成论和哲学思辨,解说天地万物。他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,太极由无极所派生,太极动静而生阴阳,阴阳生成五行,五行造化万物。他还由天及人,阐发心性义理,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论基础,堪称系统提升儒学哲理的“开山祖”。

程颢、程颐认为,“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”,先有理后有物。人伦道德和纲常之礼,就是天理,甚而主张“性即理也”。还提出“格物致知”“穷理”等。二程批评佛学又吸纳其义理,初步完成儒学的哲理提升,使之向理学嬗变。

朱熹构建的理学体系包括理气论、心性论和格物致知三部分。理气论以理为“形而上之道”,气是“形而下之器”,天理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总名”。心性论主张“性只是理”。格物致知表现为“即物”“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”“豁然贯通”三步骤。朱熹集理学之大成,系统地完成了理学的哲理升华。

陆九渊受禅宗“即心即佛”等影响颇大,自称是“剥落”物欲的“简易”之学。他认为道德意识也是理,“心即理”。其认识论途径为“收拾精神,自做主宰,万物皆备于我”。王阳明早年对佛、道颇感兴趣,提出良知即天理、“心外无物”“良知”“乃天命之性”“天下无性外之理”等命题,以深刻的理论探索及实践色彩,集心学派之大成,同时把理学的哲理升华推向完美。

如果说“三教交汇”是儒、佛、道从冲突并立到“相资为美”的思想文化繁荣,作为第三次繁荣的理学复兴,既是对早期儒学的更新,也是弥补与佛、道的差距,最终完成了儒学哲理层面的升华。同时,朱熹倡导“明天理”“捐去物欲”,王阳明身体力行,既“破山中贼”,更“破心中贼”,朱陆二学“同植名教,同扶纲常”的治世功用,愈为凸显。哲理升华与政治哲学并茂,重新造就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。

概言之,数千年来思想文化在多元兼容中发展繁荣,在碰撞争鸣中升华更新。即使是第三次高潮之后,依然能够看到它的精彩尾声,那就是明清之际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近世启蒙思想横空出世及其对宋明理学的扬弃。

拾遗

宋庆龄:睡狮将震动世界

宋庆龄15岁那年,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。有一次班里讨论历史问题时,一位美国学生说:“我认为,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,你们看,那些所谓文明古国,比如亚洲的中国,已经被历史淘汰了。人民的希望在欧洲、在美洲、在我们这里……”

宋庆龄听到这里站起来说:“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,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。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,没有被淘汰,也不可能被淘汰。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,但它决不会永远沉睡下去。总有一天,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!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,勤劳的人民,悠久的历史,富饶的物产,有无数革命志士,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!”她刚说完,教室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梁启超:折杏花被父教育

梁启超家教很严。小时候,他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,看到主人家院子里的杏树蓓蕾初绽,便悄悄折下放进袖笼里。对孩子甚严的梁父当场便以出楹联方式不动声色地教育了梁启超——“袖里笼花,小予暗藏春色”,听到梁父出的上联,梁启超恍然大悟,羞赧地对了下联,“堂前悬镜,大人明察秋毫”。

白居易:离任杭州留俸

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,一次游天竺山,发现两片山石玲珑奇巧,爱不释手,便取了玩赏。后以诗自遣:“三年为刺史,饮冰复食蕨。唯向天竺山,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,无乃伤清白。”仅为两片山石,他还怕损了清名。离任时,他把自己绝大部分俸钱留在官库,“俸钱守者,公用不足,多假而复填,如是五十年”。

唐代:“高考”曾延期

唐文宗太和八年(833)夏秋之际,各地解试已毕,但因为“蝗旱相因,恐致灾荒”,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,用当时的话说,叫“权停贡举”,一时舆论哗然。

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?原来,按唐制,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中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,因秋收受损,物力不造,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。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始,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:觐见天子、拜谒先师、疏名到列、结款通保……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。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,“念彼求名之人,必怀失望之志”,于是“宁违我令,以慰其心”,下诏恢复次年春闱,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,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。

“知府”:明朝才成为正式官名

魏晋时期,州刺史同时兼着将军的职务。州刺史是文职,将军是武职。州有州的衙门和幕僚,将军有将军的衙门和幕僚。将军的衙门,就叫作“府”。

到了唐朝,中央政府府非常重视,在首都、陪都以及皇帝登基前任过职的州普遍设置府,比如京兆府、河南府、太原府等。府的长官,叫作府尹。五代按照唐的制度沿革下来,基本没有多大变化。明清时期,除了首都、陪都所在地的府长官仍叫府尹外,一般的府长官,都称为“知府”,在史书上以正式官名确定下来,对府的职权、责任和义务有了详细的规定。

明初,按缴纳纳税粮多少,“府”被分成几等:京府尹为正三品;纳粮20万石以上为上府,上府知府从三品;10万石以上20万石以下为中府,中府知府是正四品;10万石以下下府,下府知府从四品。

放下执念 释然于怀

清风慕竹

在王安石仕途成长的道路上,韩琦是他的第一个上级,但这个老上级却不似别人的上级对晚辈晚生“扶上马再送一程”,而是始终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他头上。

庆历二年(1042),王安石进士及第,分配的第一份工作是任秘书郎兼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,简称“金判”,工作地点在扬州。此时韩琦正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,因此成了王安石不折不扣的顶头上司。

遗憾的是,韩琦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印象并不好。原来王安石虽然已经高中进士,并拥有了一份舒适的好工作,但他却依然醉心于读书,“每读书至达旦”,读起书来就忘记了时间,常常一抬头就将黎明。于是赶紧稍微眯一觉,醒来时太阳已高,急忙赶往州府去上班,多数时候都来不及洗漱,所以总是一副邋里邋遢、精神萎靡的样子。韩琦对此很不满意,他是个要求很高的人,史书称他少年时“有大志气,端重寡言,不好嬉游。性纯一,无邪曲,学问过人”。韩琦很重视官员的形象,要求面必净、发必理、衣必整,为官要有威仪,首先穿戴就得庄重,偏偏王安石对这些都不在意,因此两个人出现了认知上的鸿沟。

韩琦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,有一次他忍不住把王安石叫来,语重心长地劝告他说:“君少年,无废书,不可自弃。”意思说,你年纪轻轻,应该认真读书,不要自弃。王安石一听,知道上司误解他了,以为他和那些年轻官员一样,“夜饮放逸”,逛花楼,吃花酒,纵情享乐,但他也懒得解释,只随口答应下来。回来

后他对别人说:“韩公非知我者。”老领导是不了解我啊!

随着时间的流逝,韩琦对王安石的才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在议论公事时,王安石经常旁征博引古代的事例典故,虽然显得很有学问,但却让韩琦觉得这种言论迂阔,非常书生气,缺乏实际办事能力。王安石任职期满告别扬州后,韩琦曾收到一份文书,里面有一些生僻的古字都不认识,他笑着对僚属们打趣说:“可惜王安石不在此,此人颇能辨识难认的古字。”在韩琦的眼中,王安石的能力仅限于此了。

后来,韩琦入朝为相十年,扶立了英宗、神宗两任皇帝,有人弹劾他专权跋扈,他干脆递上了辞呈,急流勇退。宋神宗再三挽留,无奈韩琦去意已决,只得签发诏书同意,临别前,他问韩琦说:“您离去后,谁可以托付国事,王安石如何?”原来神宗二十岁登基,颇有志向,早听说王安石的大名,想起用他实施改革。韩琦回答说:“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,处于辅弼大臣的地位则不行。”

再后来,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,以富国强兵为目标,陆续推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市易法等一系列改革,这些改革举措初衷是好的,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,出现了不少反对之声,其中老领导韩琦的声音格外刺耳。

韩琦上疏神宗皇帝说,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,户等越高,借钱则越多,而那些富户本身并不缺钱,因此被地方官员强制借贷。而且贷给农民的青苗钱

“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”,这相当于“官放息钱”,政府成了放高利贷的人,“与初抑兼并、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,欲民信服,不可得也”。

韩琦的反对一度令宋神宗的思想出现了动摇。王安石大怒,他将韩琦的奏疏拿到为改革而新设置的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,逐条批驳,发布于全国。这件事标志着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公开的决裂。

不久,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落寞收场,王安石外调淮南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江宁府,黯然去了南京。熙宁八年(1075),韩琦在家乡相州(今河南安阳)溘然长逝,享年六十八岁。听到老领导去世的消息,王安石百感交集。两个人因政治见解的不同,相争多年,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,他提笔写下了《忠献韩公挽辞二首》,称赞自己的老上级“心期自与众人殊,骨相如非浅丈夫”,在诗的最后,他深情地写道:“幕府少年今白发,伤心无路送露輶。”当年幕府里的少年如今也已满头白发,可惜不能给您送上一架灵车啊!王安石一生以性子执拗著称,人称“拗相公”。虽然老上级韩琦成了他一生搬不动、移不走的绊脚石,但他还是选择了放下。王安石在历史上成为著名的宰相,除了过人的胆量,还因为博大的胸怀。

《菜根谭》里说:“东海水,曾闻无定波,世事何须扼腕;北邙山,未省留闲地,人生且自舒眉。”从未听说大海的波浪平息过,北邙山的墓地也不会留下空闲的地方,身外的事为之忧虑无益,且舒展眉头,享受当下。这正是人生的真相,真正让你沉重的不是别人的偏见,而是你内心的执念。唯有放下,释放了别人,也释放了自己。

历史随笔

科场“快枪手”

晏建怀

武士对决讲究眼疾手快,而在宋代,举子考进士中状元同样也看出手快不快。

宋太祖夺取天下后,对唐末五代武夫乱国的局面颇伤脑筋,采取扬文抑武之法,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恢复隋唐旧制,开科取士。开始,宋太祖并未确定殿试这一程序,科考全过程均由礼部主持,最后只把结果告诉自己即可。但开宝六年(973)那场科考结束后,新录取的进士到讲武殿向皇帝谢恩,在面对面的交流中,宋太祖发现新录取的进士武济川、刘睿等人学识浅薄,答非所问,武济川恰是主考官的同乡,这让宋太祖很不高兴。后来,又有人告发,状告这次科考取舍不公。震怒之下,宋太祖将礼部已经录取的和部分未录取的举子共两百余人,一起召到讲武殿,亲自主持,重新出题,重新考试,重新录取。此后,殿试就成了宋代的科考定制和最高门槛。

宋太祖武夫当国,更欣赏那种下手快的高手,他规定,参加殿试的举子,都要完成三个题目,谁最先交卷即为状元。有一次殿试,宋太祖甚至同时遇到了两个“快枪手”。开宝八年乙亥科殿试中,举子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,同时交卷,宋太祖犯了难,一场科考总不能出现两个状元吧?于是,颇好搞笑的宋太祖就让两人在朝堂之上打了一架,谁赢谁为状元。结果,王嗣宗摔倒了上打,中了状元,王嗣宗因而被人戏称“手搏状元”。

到了宋太宗时期,依然遵循太祖旧制,短则一年,长则三年举行一次考试,依然以出手快为取舍标准。“太宗时,亲试进士,每以先进卷子者,赐第一人及第”。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)丁丑科的吕蒙正,到后来的胡旦、苏易简、陈尧叟等,个个

都是才思敏捷的“快枪手”,题目拿起就能动手,文如泉涌,一挥而就,皆因抢先交卷成了状元。

虽然“以先进卷子者,赐第一人及第”,然而皇帝们的初衷并不单是以行文快慢为唯一的取舍标准,他们的要求是文理顺而才思捷,即又好又快。但是凡事断章取义者多矣,又好又快落实到下面就变成了无所谓,只寻求快了。于是,普天下的读书人纷纷寻找成章捷径和答题良方,管它文辞美不美,义理通不通,下笔千言,胡拼乱凑,“唯以敏速相夸”,只要下手快就行。从太平兴国初到淳化的数十年间,科场拼凑之风,轻浮之风盛行,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。

宋太宗淳化三年(992),举子李庶几甚至牵头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文竞赛。他把那些将要参加当年壬辰科考试的举子们,集中在京城一个烧饼铺里,以厨师烙好一个饼的时间完成一韵诗者为胜,闹得路人侧目,沸沸扬扬。事情辗转传到了宋太宗的耳边,这不是拿堂堂科考开玩笑吗?宋太宗雷霆震怒,决定采取措施来刹刹这股歪风。

殿试的时候,宋太宗特意从《庄子·寓言》中,摘出“寓言日出”四个字,拟了一道非常冷僻的赋题,他要看看这些平日以敏速相夸的考生们,是如何抓耳挠腮的。考题发下去不久,众考生还在眉头紧锁之际,李庶几就草草成篇,抢先交卷了。看到他那轻松得意的样子,宋太宗不禁怒火中烧,对着李庶几大声呵斥,当场把他轰出了考场。这次,文思敏捷的李庶几落了榜,成文慢慢腾腾的孙何却中了状元。

从此,科考不再以答卷快慢为标准,科场“快枪手”没了市场。